

从上青云到入草原：滕丛丛导演对生命价值的呈现

丁万珲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省长沙市，410000；

摘要：2019年，滕丛丛自编自导个人首部电影《送我上青云》上映，入围第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导演处女作奖，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她，师从第四代导演谢飞，在时隔五年后的2024，携自编自导的新作《我的阿勒泰》重回大众视野，一举入围戛纳电视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作为一位女性导演，她的作品以女性为观察主体，表现着不同生命体在社会环境中不同的价值与作用。

关键词：《送我上青云》；《我的阿勒泰》；滕丛丛

DOI：10.69979/3041-0673.25.08.058

时隔五年，导演滕丛丛带着自己的新作《我的阿勒泰》重新回归大众视野，虽然与她的前作《送我上青云》并非同一个影像载体，但其中所要表达的价值内核却不尽相同。作为一名女导演，讲述着女性为主体的故事，自然被人为是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创作，事实上，比起说她的作品是女性主义作品，她的作品更像是以女性为观察主体，去表现的不同生命体在社会环境中不同的价值与作用。正如她在采访中所说的那样，“作为女性，刻画女性是不用特意强调的事情，我想做的是通过女性导演的思维与镜语讲述出更宽泛和具有现代性意义的主题。”^[1]这在她的两部作品中都得以窥见。

1 作为观察主体的主人公

在《送我上青云》中，主人公盛男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拯救自我的命运，她展现了一名女性是如何被社会规训，又如何反抗到自洽的过程。在影片开头，她就被告知自己得了卵巢癌，不仅只剩下五年的寿命并且在整个卵巢被摘除后她将不再能感受到性爱的快感，“当动物只能凭借生物本能经历生老病死时，人来却能经历各种实践，将生命变为一种目的性活动。”而她同时又是现代社会高知女性的代表，为了个人社会价值的实现考取博士学历，因为向往海明威那样的人物而成为了记者，这些都是她强大人格的体现，但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即便拥有如此独立的身份，她依旧被社会侵染了“被凝视”的思想，被寄托了“盛男”这样的夙愿，在得知自己患病的后很自然地认为这是乱搞男女关系才会得的病，在妈妈跟老李眉来眼去时用“搞破鞋”来形容她的行为，对“养小三”的父亲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她羞于面对身体的欲望本身，厌恶四毛对金钱的崇拜，但却也默认它

的可行性。^[2]

作为一名女导演滕丛丛很自然的把观察主体的身份放置在了主人公盛男身上，在去往深山的途中，盛男“凑热闹”的看着老骗子施展骗人的技巧，这时画面中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而此时镜头并没有随着声音迁移而是一直停留在盛男的脸上，直到声音的主人刘光明从前景入画，镜头的焦点也始终是盛男的面部表情，同时对刘光明的脸部做了虚焦的处理，盛男被当做镜头视点的唯一掌控者，以此表达她欲望萌芽出现的细微过程，男人的样貌、行为被刻意忽略正是一种被对象化形式，盛男打量、充满欲望的眼神没有被回避，而是被充分表现，她成为了欲望主体、“凝视”主体。这样的设计在影片中后期被再次放大，刘光明正在向盛男大谈人生哲学，但镜头以特写的形式停留在盛男脸上，眼神里充斥着欲望表达，于是下一秒她毫不掩饰地说出了内心的欲望，她打断了说着时间哲理的刘光明说出了那句“我想和你做爱。”，她赤裸、坦诚的表达着自我，即便面对刘光明的落荒而逃她也坦然接受，导演没有强行让男性角色替她完成行动，也没有收到“女性镜头”的优待，她孤零零地承受着个人行为带来的一切结果。

而五年后的《我的阿勒泰》中，我们看到了导演对此类表达的升级化处理，她用更多地镜头语言去呈现这样的“女本位”视角。在《我的阿勒泰》中，通过镜头我们几乎感受不到女主李文秀的性别特征刻画，即便是沐浴画面，导演也拒绝向我们展示李文秀漂移的长发、曼妙的曲线这些性别属性，更多地刻画留在了描述李文秀的社会属性与精神属性上，“只有当一个角色被剥落了明显的性别特征时，她（他）才能顺其自然的占据镜头的视觉中心和人物关系的核心位置，这正是我作为一

名女导演在性别因素控制下形成的角色认同。”^[3]所以我们能看到，在《我的阿勒泰》中，男主巴太的出现总是带着最具男性荷尔蒙的色彩出现，他骑马、刁羊，配合着草原上肆意横飞的植被展现着他最原始的男性魅力与吸引力。

在《送我上青云》中，盛男苦苦寻求着30万的治病费用，她求助她鄙夷的父亲、求助她看不上的同事四毛，答应厌恶的“爹味”李总的写自传工作，就在她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她个人顽强又独特的人格魅力获得了书画家老李的赏识而得到了一幅赠画，而这幅作品的商业价值远远要超过能救她性命的30万。就像她原以为只有通过男性才能满足欲望，于是四处寻觅，最后却是在自己的行动中完成了对性快感的追求，就如贯穿着本片的“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盛男在最后张开双臂拥抱山顶的微风时才恍然大悟，就算没有凭风借力她也依旧可以上青云。她去爱，去生活，去受伤，最后实现了个人价值，真正感受到了生命价值。《我的阿勒泰》中的李文秀也是如此，她片面的认为只有留在大城市她才能够成为作家，她不接受阿勒泰就像不能够接受自己就此平庸下去的饭店服务员命运，她不明白怎么爱，怎么生活，怎么受伤，最后与巴太的诀情是她彻底回归现实的一笔，现实的残酷让她实现了成长，也填补了缺失的情感，在被拖行着摩擦起火的遭遇里她感受到了现实与幻想之间脆弱的那根线，她才彻底明白了生活的意义，也因此打通了文字描摹的能力，实现了与阿勒泰的磨合，也学会了与现实的通融。她的创作不再是空泛的遐想，而是切肤之痛的写作，她终于真正实施了写作这件事情，也终于明白了她的价值。

2 被看见欲望的母亲

在《我的阿勒泰》中，母亲张凤侠爱讲粗话，不修边幅，每天喝的烂醉，即便对去世的丈夫有所眷恋也不影响她追求新的爱情，她会偶尔念叨“真想好好谈一场恋爱啊”。这也是《我的阿勒泰》在改编过程中倍受争议的一件事，大多数观众认为潇洒自由的张凤侠不应该想要爱情，滕丛丛在访谈中提到过，“不要有恋爱戏只是另一种方式的慕强，你认为理智、冷酷、自私、只爱自己才是一种强大的话，那我觉得是偏颇的，我觉得女性身上的多情、浪漫甚至是情绪化，甚至是很容易与人共情、她的包容、她对这个世界的慈悲心，她也是一种强大。”^[4]“父权社会要求我们抛去‘本我’的真实，

佯装出一个符合父权要求的坚强外壳，把属于个性和个人的情感泡沫抛弃。”^[5]因此，我们在《阿勒泰》中见到了不着调的母亲张凤侠，她会轻信“渣男”的甜言蜜语，会被骗财骗色骗感情，这样所谓“离经叛道”的事情，其实本就是为人的权利与自由。

《送我上青云》中的母亲梁美枝也是如此，她稀里糊涂地过着日子，像个长不大的孩子，每天沉迷于把自己打扮的更年轻，生活里离开女儿就没有自理能力，所以知道女儿要去深山上工作很长时间时她撒娇着要女儿带上她，她心智也是幼稚的，在知道丈夫出轨后，难过的同时也在较劲的想要试试“搞破鞋”的滋味。她渴望男人的夸赞，渴望被夸年轻漂亮，即便这一切被“高知代表”的女儿所厌恶她也依旧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对这些事情的需求。

导演给予了母亲们拥有道德瑕疵的权力，看似是对剧情幽默的加持，实际是对母亲角色最大的关怀，是对母亲与“伟大”、“高尚”形象的解绑。在她的作品中，母亲不是后代们的标杆和道德模范，以及人生路上的“圣母玛利亚”，她们不是只能用来指点迷津的成长工具，她们和尚不完美的主人公一样需要成长，需要在母亲与个人之间寻找到自己，需要跟主人公一样经历爱、经历挫折与痛苦后摸索出个人的生命价值与命运，她们拒绝被绑上神坛。

3 被规训而迷茫的男人

在腾丛丛镜头下的男人们真实而又可恨，罪恶而又可怜，她对男性的呈现使她常被陷入一种矛盾的旋涡中，男性观众们指责她“厌男”的同时也有不少女性角色说她“本质爱男”。这正是她难能可贵的地方，她没有偏颇地刻画着多而且复杂的男性，在她的影片中，男性不是用来衬托女性高尚的工具，不是被丑化、被抹杀、被边缘的另一种压迫，他们有“伟岸”的高光时刻，也有自私的一面，但不同的是，在她的作品中目的性强大的男性往往都很难找寻到自我价值的出路，他们常以迷失之姿走向结局，他们把对金钱的顺从与追索看作是对个人命运的实现，正如福柯所写的“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在流动，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又向往拥有权力。而财富或财产不像权力，无法确定位置，它们可以被据为己有，被牢牢掌控在手中。”^[6]

在《送我上青云》中的四毛就是如此，他被金钱与

财富诱惑，对油腻但富有的李总点头哈腰，他常把金钱挂在嘴边，一遍又一遍的对盛男重复他当记者的目的就是为了结识权贵实现阶级的跨越。四毛是对男性权力社会积极融入的表征，是对其等级秩序抛弃自尊式的绝对服从，他将世俗的成功标准视为人生最高的信仰的执念，这正是父权社会对男性塑造的一种典型人格，只有得到权利集团与上流阶级的认可，才是对生命价值的视线，他的人生才得以圆满。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到的那样，“女性从不是一种性别，而是一种处境。”影片呈现了四毛的过去，在获得了记者荣誉的同时他没有却没有获得地位的认可仍旧是被权势羞辱的状态，于是他愤怒将奖杯摔进垃圾桶里，与奖杯同时碎裂的，是他曾引以为傲的自尊。

同样的角色也出现在《我的阿勒泰》中，当高晓亮这个人物登场时，他的每一句台词每一个行动都离不开“挣钱”二字，他与四毛一样，都是将世俗的成功当做正义的一类人。在高晓亮眼中阻碍他获得成功的人就是“反派”，就是“仇人”，为了金钱可以欺骗、可以出卖。他们对剧中的女性给予帮助，却必须在这种帮助中索取相应的回报，四毛帮助盛男找到了赚钱的办法，但他也需要她出众的文采，高晓亮给了张凤侠需要的呵护与陪伴，但他也需要在集市上报出张凤侠的名字才能让手中的木耳拥有价值。他们借此力量，却只攀附男性权力集团，并且以在这个集团中获得价值认可为荣耀。当《我的阿勒泰》在结尾部分，高晓亮被男性权力集团耻笑时，却只敢将愤怒的矛头指向张凤侠。

没钱让这些男性角色感到恐惧和焦虑，没钱意味着没有财富和地位，意味着在男性掌控的等级位阶中处于底层的位置，在他们的视角中意味着在社会里没有得以生存的一席之地。父权社会将他们洗脑成为符合所谓合格上进标准的男人，也给他们这类典型人格拷上了无法摆脱的枷锁。他们的害怕不被认同，害怕成为被社会放逐的存在，他们始终找不到个人存在的答案而就此偏执且极端下去。事实上，在我们传统的性别秩序下，被异化的不只是女性，男性同样是被压抑于异化的群体，只是女性被异化为物品，而男人被异化为无所不能的神，不能成为强者，成为神的男人，同样如无根浮萍，不知该如何生存，也不知该如何自洽，也寻找不到能满足自我的实物。

4 结语

虽然滕丛从目前可供观赏的作品仅有两部，但《送我上青云》与《我的阿勒泰》在时隔五年后形成的互文与相同的价值传达，都让人见证了导演能力与才情，她强大且细腻的共情与观察能力总给人以新的思考，虽然叙事的载体不同、文本不同、方式不同，但不同的叙事形式可以运用同样的技巧：序幕、倒叙法、预叙法、无所不在的作者、选择视点等等……当一个导演运用这些叙事手段时，他就是一个吸取历史悠久的技巧，把它故事搬上银幕的说书人。^[7]她以对不同生命对自我价值的实现与探索为主旨和切入口，以不屈不挠、赤诚天真的女性角色视点，让观众见证在相差甚远的地方讲述着几近相同的故事。从“上青云”到“入草原”，人们始终都是为了自己，为了更好的活着而“去爱，去生活，去受伤”。

参考文献

- [1] 来源：界面新闻，专访 | 《我的阿勒泰》导演滕丛丛.
<https://www.jiemian.com/video/AGUCMAhmB2MBP1Vm.html>.
- [2] 吴云. 生命本体论视角下的《送我上青云》[J]. 电影文学, 2020, (21): 94-96.
- [3] 滕丛丛, 许航, 施琳慧. 女性视角下的社会浮世绘——《送我上青云》导演滕丛丛访谈[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19, (11): 70-75.
- [4] 来源：新周刊，专访《我的阿勒泰》导演滕丛丛：李娟的幽默感，也在治愈这个时代 <https://www.newweekly.com/article/shp1542993729>.
- [5] [法] 米歇尔·福柯 (Michel · Foucault). 规训与惩罚[M]. 上海三联书店, 2003.
- [6] [法] 米歇尔·福柯 (Michel · Foucault). 规训与惩罚[M]. 上海三联书店, 2003.
- [7] 杨远婴. 电影理论读本[M].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2.

作者简介：丁万珲（2000.10.9），男，汉族，湖南省攸县人，硕士研究生，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方向：影视艺术。